

海外撷英

# 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将出现本世纪首次上升

## 盖茨基金会呼吁将稀缺资源投入最关键领域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在今年的目标守护者年度大会上,比尔·盖茨曾表示,如果全球卫生援助资金削减趋势持续,本世纪儿童死亡人数将在今年出现首次上升。

12月4日,盖茨基金会发布的本年度《目标守护者报告》印证了这一担忧。

据了解,自2000年以来,全球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持续下降,从每年1000万例减至低于500万例——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2024年,这一数字降低到460万。然而,《2025年目标守护者报告》采用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的模型分析,预计今年这一数字将增加20多万,达到约480万,成为本世纪以来的首次上升。

除此之外,各国还面临高额债务、卫生体系脆弱等挑战,疟疾、艾滋病和脊髓灰质炎等疾病的防控成果也面临付诸东流的风险。

但报告用全球各地的案例说明,“我们仍有机会改变这一局面,哪怕是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借助那些已经验证有效的解决方案和突破性的创新,我们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大的影响,挽救数百万儿童的生命,守护来之不易的进步,消灭困扰人类已久的顽疾。”

### “人类正站在十字路口”

“目标守护者”是由盖茨基金会发起,旨在推动全球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又称“全球目标”)的行动。每年,盖茨基金会通过发布年度报告来分享这些目标背后的数据和故事,希望借此激励新一代的领袖,帮助大众增强对进展的认识、号召各国领导人承担责任,并促使更多人采取行动实现这些目标。

今年《目标守护者报告》的主题为“挽救儿童生命 岂能就此止步”,报告进一步警告称,如果按照当前一些主要捐助国正在考虑的全球健康资金削减幅度20%来看,到2045年,全球可能会增加1200万儿童死亡;如果削减幅度达到30%,将增加1600万儿童死亡。

报告表示,如果按照这一趋势,我们将成为“几乎完成目标”的一代人,即几乎让儿童免于可预防的疾病,几乎让疟疾从地球上消失,几乎让艾滋病成为历史。

比尔·盖茨表示,全球健康事业正处于转折点,正确的抉择仍可挽救数百万生命。

盖茨写道:“我们这一代或许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科学与创新,却因为筹不到足够的资金,而让这些成果无法真正用于挽救生命。通过明确优先级、作出坚定承诺并投资高影响力的方案,我坚信,我们能扭转儿童死亡人数上升的趋势,并到2045年前挽救更多儿童生命。”

### “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今年,面对国内挑战、高额债务及人口老龄化的困扰,捐助国大幅削减了全球卫生发展援助资金。根据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最新研究,从2024年到2025年,全球卫生援助资金总额下降21%,创15年来新低。

在全球卫生预算不断缩减的背景下,今年目标守护者大会就聚焦于展现那些能够加速推动变革的伙伴、科学创新成果和政策方案,助力全球领导人以更少资源实现更大成效。

比尔·盖茨在报告中也直言,“我们必须马上行动,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这并不是一个新理念。长期以来,他们(各国卫生部门)都必须在有限预算内实现效益最大化。但今天,许多国家的债务支出超过了医疗或教育支出,所以每一块钱都必须花在刀刃上。”

为此,报告给出了一份进步路



比尔·盖茨在今年纽约举办的目标守护者年度大会上

线图,将精准投入与规模化创新相结合,即通过投资初级卫生保健、优先支持疫苗等让每一块钱都能发挥更大效用的手段和支持开发下一代的创新,我们能够实现“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 投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

报告认为,投资于初级卫生保健系统是以有限资源挽救最多生命的最佳选择。

初级卫生保健系统能够帮助孕妇安全分娩,阻止肺炎发展到危及生命的程度、为儿童接种疫苗避免疾病暴发、精准识别新的威胁以防止其演变为全面危机。而且它具有显著的成本效益,每人每年不到100美元,就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预防高达90%的儿童死亡。

2019年,尼日利亚的穆罕默德·伊努瓦·亚哈亚(Muhammad Inuwa Yahaya)担任贡贝州(Gombe)州长时,当地正面临历史性的预算赤字。

亚哈亚没有坐以待毙,他表示:“通常,人们认为削减预算可以省钱。但真正能省钱并救命的是有远见、有计划、有目标的开支。”

亚哈亚当时做出了选择:集中资源、重新建设,把重心放在最基础的事情上——初级医疗、教育和信任。“如今,贡贝州的每个行政区都有了一个已被翻新或新建的初级保健中心,共计114个,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提供服务。超过30万人参加了本州的医疗保险计划。我们还新建了三所综合医院,重建了专科医院。这一切都不是依靠援助资金完成的,而是利用了原有的预算。”

在肯尼亚,面对资源日益匮乏、支持不断减少,社区卫生工作者约瑟芬·巴拉萨(Josephine Barasa)也从未放弃。她在无薪水的情况下,坚持筹措资金、场地和各类资源,筛查遭遇性别暴力的女性,为她们孩子提供健康教育和基础护理。

### 疫苗仍是效益最大的选择

报告表示,本世纪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减少一半的最大“功臣”为疫苗。自2000年以来,已有超过12亿儿童通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接种了挽救生命的疫苗。

据悉,每投入1美元用于免疫接种,就会给国家带来54美元的回报。报告认为,这回报还不包括它在改变人生层面的影响——健康的孩子可以去上学;健康的父母可以工作养家;健康的社会在经济上日趋强大,就能更多地投资于人民。

曾两度担任塞内加尔卫生部长的阿瓦·玛丽·科尔·塞克博士(Awa Marie Coll Seck)回忆到,在她的文化中,曾经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在孩子活过五岁、挺过麻疹之前,你不算真正拥有一个孩子。”

塞内加尔医院的病房曾经住满了麻疹患儿——很多孩子会带着脑损伤回家,也有很多孩子再也没能回家。后来,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支持下,塞内加尔加强了常规疫苗接种体系。随着更多儿童打上疫苗,麻疹病例急剧下降,从2000年的24000例降到过去几年的几百例。今天,许多曾经拥挤的病房已经关闭。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它

也很脆弱,因为每次常规疫苗接种被耽误,致命疾病就会卷土重来。而追赶的成本远高于维持接种的成本。这就是今天给孩子接种疫苗的意义,这不仅是投资于他们的未来,也是投资于整个国家的未来。”报告认为。

### 持续开发新一代创新工具

报告指出,对开发新一代创新工具的投入有望彻底消除疟疾、肺炎等对儿童构成最致命威胁的疾病。报告模型预测,持续投入这些领域的创新,到2045年可挽救数百万儿童的生命。

如今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了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指南,在已建立了PCV接种规划的国家采用简化接种方案。肺炎是5岁以下儿童的主要传染病杀手,而PCV则有助于保护儿童免受肺炎的侵害。在简化接种方案后,儿童不必再像之前那样接种三剂,而是只需接种一剂基础疫苗和一剂加强针,就能获得同样的保护。

如此,借助能在更少接种次数下提供同等保护力的疫苗,各国就能将更多资金重新投入医疗系统建设。如果符合条件的国家都改用两剂次方案,到2050年就可节省约20亿美元。通过简化接种方案省下来的钱,各国可以重新投资扩大疫苗覆盖范围,或引入疫苗来对抗其他导致大量儿童死亡的疾病。

而在抗击疟疾领域,大约20年前,科学家们开发的双活性成分蚊帐,将两种不同的杀虫剂组合起来对抗蚊子耐药性。这类蚊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规模推广,实现了史上最快的疟疾死亡率下降,在17个国家的早期应用中,这类蚊帐已帮助预防了1300多万疟疾病例。

到2045年,新一代疟疾防治工具能挽救570万儿童的生命;而包括来那卡帕韦(Lenacapavir)在内的长效艾滋病预防工具可以帮助高负担国家将感染率和死亡率降至趋近于零。

### 呼吁共同行动

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以下简称“全球基金”)的工作同样印证了持续投入的成效。作为全球健康领域最有效的引擎之一,全球基金自2002年创建以来已挽救7000多万人的生命,并将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的总死亡人数降低60%以上。上月底,各国领导人在全球基金第八轮融资中认捐113.4亿美元,既彰显了全球持续抗击这些疾病的决心,也揭示了如果不采取行动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报告呼吁各国政府、慈善组织及公民参考报告结论并采取行动:保持或扩大资金投入,增加慈善捐赠,并提醒各国领导人——无论孩子出生在哪里,他们都应担当有生存与茁壮成长的机遇。

比尔·盖茨写道:“我们岂能就此止步。如果我们现在能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并让世界重新回到能为儿童健康投入更多资源的状态,那么二十年后,我们将能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一个我们如何帮助更多儿童平安降生并顺利度过童年的故事。”

寻找慈善传统

上海开埠后,英美租界与法租界迅速崛起为城市重心,传统老城厢在城区面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则开始相对衰落。在此过程中,上海本地士绅与外来华人移民依托老城厢的慈善组织与资源,通过众人接力和代际传承方式不断向租界拓展慈善救助事业。本地慈善家与外来华人移民通过在老城厢、租界及闸北新城区慈善组织中的交叉任职,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慈善网络。

## 近代上海租界华人慈善事业的空间扩张

### “接着办”与“照着办”： 华人慈善在租界的扩展

上海租界建立后,上海老城厢传统慈善组织几乎是紧跟着租界的扩张步伐而不断拓展在租界内的慈善救济业务,并在坚守中不断学习外来的慈善理念和方法,不断进行组织调适和改组,以适应新的都市环境需要。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晚清到民国结束,整个上海新建华人慈善组织至少245个。晚清时期,老城厢地区新建慈善组织最多,公共租界和乡镇亦建不少,法租界有2个,华界新城区闸北有5个。民国时期,公共租界地区新建慈善组织数量远远超过老城厢,但老城厢地区慈善组织的数量依然多于法租界和其他乡镇,闸北区的慈善组织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法租界在1914年最后一次大扩张后,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繁华起来,因此这一时期法租界新建了不少慈善组织。

租界在短期内迅速兴建的大量华人慈善组织,与老城厢传统善会、善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60年,英租界建立了第一个华人慈善组织同仁保安堂。其创办缘由是因为租界“未有善堂收埋毙尸事宜”,因此由同仁辅元堂任之,但由于城墙和壕沟阻隔,且距离较远,“报殓需时”,又由绅商创设同仁保安堂,与同仁辅元堂分工办理慈善事业。

同仁永善堂是公共租界比较早的综合性善堂,创办于同治八年,由王永绪、同养信、郑增华等奉上海县令之命设立,设有南北两堂,办理施粥、恤贫、赡老、义塾、施衣、施米等十项善举。

闸北新城区较早设立且影响比较大的慈善组织是同善粥厂,同样由来自老城厢的果育堂和普育堂董事联合创办。新普育堂是另一个典型例子。1912年3月,果育堂、普育堂等老城厢12家慈善组织在同仁辅元堂商定成立上海慈善团,“酌盈剂虚”,统一管理所有老城厢慈善产业,统一规划办理各项善举;并商定成立新普育堂,集中办理收养穷民无助者以及施医给药等业务。新普育堂在老城厢成立后,即开始积极拓展租界外业务,在上海各城区和多个乡镇设立分支机构,基本上就是老城厢华人慈善组织走向租界和新城区的缩影。

这些慈善组织主要由上海士绅和外地来沪移民在新城区“接着办”老城厢原有的善举,基本上是将老城厢慈善组织“复制”到新城区,或者是设立新的分支机构。还有一类慈善组织则是外来移民仿照老城厢慈善组织的形式,在租界等新城区“照着办”善举;有些与老城厢慈善家群体合作创办新慈善组织,或者在新组织中吸收老城厢慈善界人士加入董事会等管理机构,继续“照着办”慈善。

设立于公共租界的仁济善堂是后一类组织的典型。仁济善堂建于1880年,举凡恤贫、赡老、施米、施医药、施材、宣讲乡约、义塾、粥厂、义家、掩埋、育婴、协賑等各项善举无不办理。到1931年,仁济善堂拥有地产和房产价值在上海主要慈善组织中仅次于上海慈善团。1928—1930年间,仁济善堂每年房地产租金收入高达8万余元,占其全部收入的80%左右。因此其慈善活动经费比较稳定且可靠,这也为其持续不断地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仁济善堂机构的完善和财产规模的不断增加,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逐渐发展成公共租界最主要的慈善组织。1927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成立后,决定将会所设在仁济善堂。这既是对仁济善堂

在整个上海慈善界地位的肯定,也象征着上海慈善事业的重心已经从城内转移到城北、从老城厢转移到了公共租界。

### 城市重心移与 华人慈善群体代际传承

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主事人群体有一个明显的迭代过程,即从本地家族传承到外地移民精英主导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与慈善组织从老城厢向租界的扩张和发展几乎同步发生,其背后则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重心的位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城市精英阶层的代际传承。

1800年,在上海知县汤焘倡议下,上海地方士绅,也是老城厢著姓朱氏家族的朱文煜、号称“城西首镇”的法华镇士绅徐思德等倡设同仁义冢;1804年,上海士绅在城内药局弄购买乔氏房屋,正式设立同仁堂,司总、司事等多为上海本地人。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同仁堂创始人家族始终在管理人员队伍中占据重要地位。

1843年,上海梅益奎与海门施湘帆、慈溪韩再桥等募捐设立施棺栈。越三年,赁药局弄同仁堂后陆氏房屋设施医局,合局栈为一,定名辅元堂。因此同仁堂和辅元堂此时已经设到一起了,堂宇前后相连。

同仁堂办理恤贫、赡老、施棺、掩埋、义学、助贫诸项善举;辅元堂主要办理施医、施棺、掩埋诸事,在业务范围上有重合。

同仁堂基本上是上海本地人所办,但辅元堂三位首倡者中有两位是外县人。辅元堂的梅益奎也参与同仁堂的管理工作。另外,在两堂的主要司事和司总中,最早响应知县汤焘倡议参与同仁义冢创设的朱文煜,其伯父朱朝坤后来成为同仁堂司总,其子朱增沂、增惠都做过同仁堂司赡老和司义冢的工作;其侄朱增龄又是辅元堂的司事。可见,主要由外地人组建的辅元堂成立后,上海本地慈善家群体积极加入,共同推进老城厢慈善事业的发展。

1855年,既是同仁堂董事,又是辅元堂董事的浙江上虞人经纬,将二堂“合而为一”,取名“同仁辅元堂”。同仁辅元堂,将二者名字都包含进新堂名称中,也意味着两堂是为了共同推进慈善事业而平等合并,显示出外来移民已经深度参与到老城厢慈善事业发展中。

1864年经纬去世后,其子经元善不仅继承了其产业,也积极参与上海慈善事业,继续担任同仁辅元堂董事,并在1877年协助老城厢另一家重要善堂——果育堂开展协賑活动。1878年,果育堂董事、老城厢世家代表之一的瞿世仁病故后,经元善又被推举为果育堂负责上海收解协賑款的主事人。

近代上海最重要的慈善家王一亭则是浙江吴兴人,他一生向善,积极创办或参与管理了众多的善会善堂,与之有关的慈善组织遍及老城厢、法租界、公共租界、闸北甚至部分乡镇;如果再算上通过其领导的上海慈善团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资助和指导下的慈善组织,那就更多了。在王一亭发起创办或参与管理的慈善组织中,每一个组织的管理机构或董事会中都会有部分人员与其他组织重合,所以以王一亭为中心实际上织成了一张慈善家网络。

近代上海开埠后,城市经济主业逐渐从沙船运输、传统金融等向现代工商业和现代金融业转变;部分新兴的洋行买办在获得高额报酬的同时,果断捕捉商机,成功转身成为现代工商业者。他们在获得经济利润和社会地位的同时,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利用老

城厢慈善组织和传统慈善文化,在租界和新城区积极推广中国慈善事业,并且一代代接力而行,呈现出明显的代际传承特征。

### “交叉任职”与华洋竞争： 慈善网络与社会整合

随着上海老城厢主要善会善堂不断向租界和闸北推进,善堂主持者们逐渐参与到租界和闸北慈善团体董事会,甚至成为主要领导者。1920年前后,同仁辅元堂总董、上海慈善团董事会主席王一亭先后出任仁济善堂副总董、总董,闸北普善山庄总董等。同仁辅元堂和上海慈善团其他董事如黄漪之、杨东山等人也纷纷进入租界和闸北其他大型慈善组织的董事会,或成为直接负责人。与此同时,仁济善堂、普善山庄、闸北慈善团等租界和闸北地区慈善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也积极参与上海慈善团等旧慈善组织的董事会,从而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1927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的成立,实际上将这些相互任职的慈善组织进一步联合起来,从而形成更为强大的巨型慈善群团,成为上海慈善界事实上的领导者。

在各大慈善组织主要负责人“交叉任职”的同时,上海主要慈善组织的负责人身份也在继续变化。同仁辅元堂组建后,虽然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同仁堂创始人及其后代的作用,但更多与创始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上海人及外地人参与该堂的管理。在租界,丝业商人如仁济善堂的施善昌、李秋坪等人一度在善堂管理上居于主导地位。随着现代工商企业和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商人如严信厚等开始在仁济善堂等的经营上发挥主要作用。另外,进入民国以后,一批有钱有闲有身份有希望,且很多身兼诸多角色的著名人物,纷纷寓居上海,亦热衷于参与慈善事业。因而到民国中后期,各传统善会善堂董事会格局大多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群体的身份、地位往往比此前那些善堂创始人或其后裔更高,也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加入各董事会后,使得这些善堂之间的联合更为可能,这也是1927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成立的前提,同时也是战时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能够有效运转的重要基础。

华人慈善人士在各善堂的相互渗透和最终联合,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上海慈善界的团结与合作,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应对另一具有竞争性的对手——租界洋人。华人慈善家和在上海的绅商积极利用租界“未有善堂”的局面创办新的慈善组织,既是华人精英面对租界贫苦无依者的自然选择;亦是在一个全新的都市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激流勇进,主动参与都市建设的方式;更是在租界内与洋人开展竞争,维护新都市社会市容市貌和民族尊严的重要方式。

华人慈善组织与租界和洋人慈善组织之间,既有抗拒与竞争,又有学习、模仿与合作,同时还具有维护民族尊严的一面。租界诸多慈善组织的设立,直接缘于华人看到界内诸多不合时宜的现象,认为有碍观瞻,或于卫生文明不合,有损国人形象或予外人以话柄。

总之,新旧华人慈善组织与华界、租界华人慈善组织主要负责入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叉任职”,进一步增强了华人在近代上海都市化尤其是租界都市化进程中的影响力,也在与洋人的竞争中维护了自身的体面。

(摘自《安徽史学》2025年第6期,原标题《慈善网络与城市社会整合:近代上海租界华人慈善事业的空间扩张》,作者阮清华、梁蓁飞)